

莫言《蛙》生命意识的建构策略

朱 妍,陈少锋

(宿州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蛙》书写了姑姑和高密乡村民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殊异姿态,彰显出原始的生命崇拜文化。文本阐述了姑姑在计划生育政策中扮演的政治角色和伦理角色,姑姑在坚守国家意志的同时,内心依然透露着人性的光辉和对生命的敬畏。随着时代使命的终结,姑姑的生命意识逐渐复苏,她以供奉泥塑娃娃的方式来实施生命的救赎。高密乡村民以抗拒的姿态抵制国家的主流意识,非理性话语背后渗透出生命意识的张扬。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人类应树立健康的生命意识,寄予生命本体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保护。

关键词:《蛙》;生命意识;生殖崇拜;生命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288(2015)04-0015-03

莫言的《蛙》以姑姑和高密乡的人物命运为线索,勾画出现代化进程中理性政治与生命伦理的矛盾。在国家主流意志与原始生殖观念发生碰撞时,高密乡村民表现出的是对生殖崇拜的尊奉,流露出的是对生命的敬畏。《蛙》书写了高密乡村民和姑姑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殊异姿态,彰显出强烈的生命意识。

《蛙》中高密乡村民的生命意识源于我国原始的生殖崇拜文化。《系辞传下》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天地、万物、男女之生皆是阴阳结合的结果。《孟子·离娄上》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孟子的话体现出生殖繁衍的重大意义,血脉传承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根本所在。在古代生产力低下、医疗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人类无法控制外界环境对自身的伤害,需要尽可能多地繁衍子嗣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因此产生了对生殖的崇拜和追求。在生殖崇拜的信仰下,人类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从国家层面上看,人口是国家必备的要素之一,国家需要人口来维持正常的运转,正如费孝通所讲的:“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而社会的完整必须要人口的稳定;稳定有赖于新陈代谢,因之引起种族绵延的需要。”^[3]从家庭层面上看,家庭需要繁衍子嗣来传

承血脉,生命的延续是家庭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绵延后代的思想已经牢牢存在于国民心里,人类自古就有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生命的传承契合了民族的文化理念,负载着民间的生殖信仰。

《蛙》通过姑姑和高密乡村民在计划生育前后的行为映射出人类内在的生殖崇拜理念,书写了人类的生命意识。“蛙”作为文化图腾,因其多子的特征深受远古人类的膜拜,文本中“蛙”的意象鲜明体现了生殖崇拜理念。高密乡村民把“蛙”奉为神灵加以膜拜,祈求多子多福,渴望生命绵延不息。姑姑在河边洗手,看到成群的蝌蚪游过,意识到人类和蝌蚪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给“我”取名蝌蚪。小狮子去牛蛙公司上班,不但不厌恶青蛙,还道出了蛙和人是同一祖先的结论。她认为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当,蛙的卵子与人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就连变态期的蛙类与三个月内的婴儿胚胎也一模一样。蛙与人类拥有众多的相似之处,文本中充斥着大篇幅的“蛙”的场景描绘,隐射出人类对种族繁衍不息的追求,表现出人类对种族强盛、生命不息的渴望。

人类和蛙之间有着隐秘的生命关联,因此,人类将蛙作为生殖崇拜的图腾,昭示了生命的宝贵

收稿日期:2015-04-1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青年人才基金项目“民初留学场域中的皖籍文人与新文学的发生”(项目编号:2012SQRW179);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虞姬形象的文化阐释及其产业资源开发研究”(项目编号:SK2013B515)

作者简介:朱 妍(1982—),女,山东临清人,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和不可侵犯,生命本体应受到庇佑和关爱,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操控下,众多的婴儿却被残害,在被压抑的时代困境中,历史的车轮把姑姑推向罪恶的边缘,在极端的时代政策时过境迁之后,姑姑开始承受着灵魂的谴责,以独特的方式来实施自我生命的救赎。

一、理性政治下姑姑生命意识的彰显

莫言的《蛙》以乡村女医生姑姑的坎坷命运折射出中华民族在计划生育语境下所彰显的生命意识。小说以姑姑的心理变化历程为主线,描写了高密乡村民对计划生育誓死抵抗的场景,揭示出理性政治与生命伦理观念的冲突,展现了村民生命意识的顽强与执着。《蛙》中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乡村医生姑姑,姑姑在高密乡扮演着送子娘娘、活阎王和赎罪者三重角色。青年时期的姑姑是从卫校毕业的新兴乡村妇科医生,在村里推行接生新法,与旧式的“老婆娘”斗智斗法,为高密乡接生了众多的健康婴儿。姑姑不仅能救难产的孕妇于危难之中,而且还可以为难产的老牛接生,姑姑也因此成为人们心中的活菩萨。这段时期是姑姑的黄金时期,她回想起来都心驰神往地说:“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我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跟着我,成群的蝴蝶也跟着我。”^[4]在鼓励生育的年代,姑姑尽心尽力地为高密乡的乡亲接生后代,延续种族,她坚守了原始的生殖信仰,维护着本真的生命意识。

在国家意识与民间信仰发生冲突之时,姑姑的身份角色背离了最初的文化信仰,她从生命的坚守者蜕变为政策的维护者。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姑姑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她极力控制违背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甚至为完成指标无所不用其极,由此高密乡发生了一系列由姑姑一手导演的悲剧。张拳的老婆耿秀莲为了避免姑姑的魔爪,拖着五个月的身孕跳入河中,姑姑本可以驾起她那12马力的机运船将其救起,避免悲剧的发生,可姑姑却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船上还放起了音乐,姑姑似乎在享受即将到来的胜利,可她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尸两命的游戏,水中的耿秀莲只是一个想保护腹中胎儿、想为张家留条血脉的脆弱母亲,当古老的游泳方式碰上现代工业化的船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耿秀莲体力不支,流产而死。耿秀莲的死没有引起姑姑的反思,随后她的行为又造成了王仁美的悲剧。姑姑为逼出王仁

美无所不用其极,采用连坐邻居的方式让王金山交出女儿,然后用糖衣炮弹的伎俩连哄带骗让王仁美去做了人流,结果又是一尸两命。无论是耿秀莲的死还是王仁美的死都无法改变姑姑固执的行为,随后姑姑又谋划了一场悲剧,促使王胆这个袖珍姑娘丧命。这一系列的悲剧展现出中国五六十年代政策高压下的残酷现象,就像莫言所说的:“历史是只看结果而不看手段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遏制了人口的增长。”^[5]

姑姑手上沾满鲜血,她在执行政策时已丧失了人性,成为一个杀人凶手。蝌蚪的父亲在文中总结说:“你姑姑住了半个月的院,伤还没好利索就从医院里跑出来,她有心事啊,她说不把王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她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责任心强到这种程度,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6]姑姑为了执行政策可以蔑视胎儿的生命,不顾孕妇的安全,她早期的神性已完全被抹杀,此时的她扮演着杀人魔王的角色。

信仰的忠诚让姑姑身上的魔性爆发出来,但姑姑的生命意识并没有消蚀得一千二净,即使在信仰历久弥坚之下她依然展露着人性的光辉。在姑姑感觉到耿秀莲的身体渐渐下沉时立即施救,用最好的药,尽最大的努力去挽救生命;在王仁美手术大出血时,立即抽了自己600cc血给她输上,并在王仁美死后登门向大哥大嫂赔罪;在王胆早产时为王胆接生;在陈鼻得知出生的是女儿不愿抚养女儿时与小狮子一起抚养陈眉。这一切都表露出姑姑并非一个毫无人性的政策执行者,她的潜意识中表现出对生命的敬畏。特殊的年代掩饰了姑姑的生命意识,让姑姑变成残害生命的刽子手,但她内心深处依然流露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的尊重。

二、高密乡村民的生命意识

计划生育的强制性诠释了赫塔·米勒的话语:“权力的不幸在于对公众的强迫,当权力想要实行时,必须展现自己。当权者因为他们的权力必须总是处于他人的目光下,他们多想把别人的眼球和目光也剥夺了啊。”^[7]计划生育政策强制要求高密乡村民实施节育,然而,传宗接代、绵延香火的理念在村民的心中依然根深蒂固,身负传统生殖观念的高密乡村民极力排斥和抵抗计划生育政策,当国家意志与传统伦理观念发生碰撞,原始的生命意识被激发出来。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一九七六年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区分了统治者对死亡的权力和对生命的权力。他认为古代君主身上掌握的生与死的权利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是刀刃上的权利,即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而现代国家的统治者不仅拥有处死人的权利还拥有对生命的权利,即通过控制人口的增长实现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计划生育对人口出生率的掌控恰好证明了这种说法。高密乡的村民在想方设法地抵制计划生育,排斥着现代文明带来的政策。避孕套被扔进猪圈,挨家挨户发送的避孕药也被女人们抗拒服用。男子们为抵制男扎在背后议论着着姑姑和黄秋雅,认为她们都是没有结过婚的变态女人,心理极度扭曲,以绝户来报复成双入对的夫妻。村中抵死反抗的人物尤以王脚为代表,誓言谁敢让他去结扎他就跟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高密乡村民强烈抵制计划生育,背后影射的是生殖崇拜的传统理念,他们坚信生命的延续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是符合人伦纲常的,高密乡村民以抗拒的姿态表达了内在的心理诉求。在国家极力控制人口的时代语境下,人类潜在的生命意识被激发出来并以极端的方式得以呈现。

《蛙》表现了以姑姑为代表的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以高密乡村民为代表的生殖崇拜的拥护者之间的冲突,意识分歧的表层下凸显了生命意识的主题。生命本体是国家运转和家族传承的基本要素,唯有繁衍后代,种族才能绵延无尽,国家才能持续发展,英国学者亚·莫·卡尔桑德斯认为:“一切有机体都繁衍其种类,繁殖显然是一种需要,因为一切生物易于因伤害而死亡,如果没有繁殖,则每种生物就会很快地灭绝,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高级生命形式中,寿命的大致明确界限业已逐渐形成,换句话说,一定时期之后自然死亡就发生了。”^[8]因此,人类繁殖有利于种族的延续和国家的繁盛,从社会角度而言,经济的增长、政治的稳定、家庭的经营都需要人口加以维持,因此,种族绵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计划生育对生命的扼杀引发了人类自然的反叛,高密乡村民以抗拒的姿态抵制国家的主流意识,非理性话语背后渗透出生命意识的张扬,建构出普泛化的民间信仰,彰显了文本的深层主题。

三、姑姑的自我生命救赎

红色信仰培育了姑姑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

诚,在残酷的年代里,姑姑俨然变成了杀害孕妇的刽子手。当时代的狂热褪去,姑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恶,那双沾满婴儿鲜血的手让姑姑恐惧、愧疚,她期望能摆脱深深的罪孽,渴望生命的救赎。随着时代使命的终结,姑姑开始反思自己早年的行为,忏悔以往的过错,她的原始生命观被激发出来,生命意识逐渐回归。姑姑从一个残害生命的凶手转变为渴望救赎的忏悔者,是从害怕青蛙开始的。生性胆大的姑姑被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在地,作品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描写姑姑被青蛙追赶的场面。四面八方汇集起来的青蛙朝姑姑鸣叫,仿佛是被姑姑残害过的婴儿在啼哭,又像是两千八百多名婴儿的精灵在向姑姑发出控诉,而后,许多青蛙团团围住姑姑,撕咬姑姑,像是来寻仇的冤魂。姑姑对青蛙的恐惧,是出于对被她亲手杀害的两千八百多名婴儿的愧疚,折射出姑姑内心深处的悔恨与不安。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生动展现了姑姑内心的罪恶感,暴露出姑姑内心深处的生殖信仰和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不仅仅呈现为对生命本体的敬畏,更蕴涵在生命救赎的渴求中。姑姑的救赎是从嫁给乡间泥塑家郝大手开始的,郝大手拯救姑姑于危难之中,姑姑被青蛙追逐的极度害怕之际碰到了正在捏制月光娃娃的郝大手,郝大手用一碗绿豆汤唤醒了姑姑,姑姑嫁给郝大手更多是为了赎罪,因为郝大手制作的月光娃娃非常形象逼真,在赎罪意识的驱使下,姑姑将自己杀害的两千八百多名婴儿的容貌诉说出来,之后丈夫郝大手亲自将娃娃制作出来,姑姑房间里三面墙壁上全部是同样大小的木格子,每个格子里都安放着一尊泥娃娃。在每放置一个泥娃娃时,姑姑都在房间正中的一个小小的供桌前点燃三根香,双手合十供奉。姑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她的救赎,她相信这些泥娃娃只要接受了供奉,就会被赋予灵性,就会投胎重生,她的罪恶才能减轻。姑姑以自我欺骗的救赎方式来释放灵魂深处的重负,彰显出其意识深处的生命本体观念,契合了原始的生殖崇拜文化。

姑姑的多重身份角色源于特定时代的差异性文化语境,在计划生育背景下,姑姑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牺牲品,她早年的使命感和正义感可追溯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阶级出身。在五六十年的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引发了经济、社会、资源等一系列问题,(下转第22页)

中的表现则是主张作品表现的内容必须是作者性情的真实流露,要求文学创作存真去伪。尝言“学贵有用,如昌黎折王庭湊,阳明平宸濠,乃真学问”^[2],从中亦看出窦氏对“真”的追求。秉承着厚性情的诗学观念,以表达主观真实性情为旨归,进行诗歌创作实践,我们总能在窦诗中窥探出其真实性情的流露。深受传统儒家思想浸染的窦光鼐,忠君报国是其坚定不移的人生志向,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沉情感。又因多次受君主保护使其官运得以延续和亨通,因此,窦光鼐颂扬明君圣主和礼赞江山社稷的诗歌自非虚与委蛇、奴颜媚主之作,反而是赤子忠心的反映。这与其为官时忠于君主、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誓死效忠国家的表现高度一致。与此同时,官场上的复杂与无奈,难免使人产生失望与愤懑之感,窦光鼐在诗歌创作中忠于自我的主观意识,偶有牢骚抱怨之语以及对闲适生活的向往之情,也并不与之矛盾,反而是人生之常情,生活之常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鲜活而非

刻板迂讷的人物形象。概而言之,窦光鼐人格与诗品的统一,人格的自我建构与诗学观念的统一皆归于一个“真”字。一个“真”字使窦光鼐的为官形象与诗人形象实现了统一。

参考文献:

- [1][10](清)刘光斗,修,朱学海,撰.中国地方志集成:道光诸城县续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395.
- [2][3][8][11][16]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261—5263.
- [3][5][6][7]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77.
- [4][9][12][21][22](清)秦瀛.小岫山人文集[M].清嘉庆二十二年刻道光间补刻本:卷五.
- [13]徐世昌.晚晴簃诗汇[M].民国退耕堂刻本:卷105.
- [14]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93.
- [15]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60.
- [17]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M].长沙:岳麓书社,1992:1121.
- [18][20](清)窦光鼐.东皋先生诗集[M].清嘉庆三年无锡秦瀛刻本:卷三.
- [19](清)窦光鼐.省吾斋诗赋集[M].清乾隆刻本: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文中引用的窦光鼐诗歌均出自本刻本)

责任编辑:陈冬梅

(上接第17页)出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是势在必行的。在计划生育实行初期,以姑姑为代表的基层干部以近乎偏执的姿态坚定地执行国家政策,为了完成指标,姑姑扼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身份标识上,姑姑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从小就受到红色教育的熏陶,这种红色教育培育了姑姑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然而,男友王小倜的叛逃给姑姑革命烈士的身份蒙上一层阴影,杨林姘头的谣言让姑姑在文革中饱受凌辱,因此,姑姑极力标榜自我的红色信仰,她企望证实自我政治上的纯洁性,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姑姑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政策执行者。可见,姑姑早期的行为是时代语境下无奈的选择,她为了摆脱舆论的压力、证明政治立场的纯洁,严格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她早期对生命的扼杀更多是源于外部环境的逼仄。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国家不再需要以极端的方式控制人口的增长,生育环境逐渐宽松,唯成分论的评判标准也退出了时代的舞台,姑姑内心被压抑的生命意识逐渐复苏,她为早年的行为深深地忏悔,希望通过供奉泥塑娃娃的方式

来进行赎罪,晚年的姑姑以本体再塑的思维实施着生命意识的自我救赎。

《蛙》将人物的生命意识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描摹,展现出人类无可违逆的生命情怀。莫言在历史的漩涡中诉说着姑姑灵与肉所承受的双重折磨,剖析了人性的真谛,诠释了生命的意义。生命是人类存在的有形架构,它不仅是代际传承的载体,更维系着民族的振兴与文化的崛起,因此,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人类应树立健康的生命意识,构架温情的时代氛围,寄予生命本体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保护。

参考文献:

-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46.
- [2]王常泽.孟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119.
-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2.
- [4][5][6]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22,145.
- [7](德)赫塔·米勒.镜中恶魔[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21.
- [8](英)亚·莫·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M].宁嘉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4.

责任编辑:陈冬梅